

目 录

中山舰事件的内幕	馬文車 遺稿 (1)
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會議	黃紹竑 (9)
“馬日事变”亲历記	魏 鎮 (16)
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	梅 原 (36)
蔣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攻	謝慕韓 (69)
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	李家白 (76)
我参加第二次“围剿”被俘脱逃記	公秉藩 (81)
孙連仲投蔣和在江西与紅軍作战失敗的经过	赵大璞 (99)
刘和鼎部在建宁被歼的回忆	郑 正 (108)
参加十九路軍在江西“围剿”的回忆	李汉冲 (114)
蔣軍王金钰、上官云相部在江西被歼紀实	李大同 (122)
蔣軍贛州守城战役亲历記	馬 崑 (141)
陈济棠进攻筠門岭紅軍的经过	曾其清 (149)
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攻紀略	宋瑞珂 (158)
我对蔣介石建議碉堡政策的经过	戴 岳 (171)

蔣軍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紀要	楊伯濤 (181)
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	宋希濂 (197)
我所知道的改組派	范予遂 (209)
国民党的魔影——CC团	刘不同 (231)

中山舰事件的内幕

馬文車 遺稿

国民革命軍开始北伐的前一年，1925年8月进行第二次东征时，我在东征軍总司令部担任秘书长兼軍法处长；同年年底，二次东征結束，所有高級官佐大多調至卫戍总司令部，我則由蔣介石亲拟电稿致国民政府，推荐为潮海关監督兼汕头交涉員，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常来往于汕穗之間。此时，蔣介石担任黄埔軍校校长，兼卫戍总司令等职。他利用亲信爪牙組織孙文主义学会，进行种种阴谋活动。茲就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追述如下。

一 东征结束后广东政局概况

东征軍打垮了陈炯明，統一了广东，蔣介石的嫡系部队逐渐壮大起来，他的政治野心也就从此更大。因此，当时在軍政领导方面就存在着以下矛盾：（一）蔣介石同汪精卫之間爭权夺利的矛盾；（二）蔣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之間的矛盾。

孙中山先生在世时，蔣介石与汪精卫因工作关系彼此经常接触，有着一定的交誼。蔣、汪都是政治野心家，为了互相利用，結成換帖兄弟。蔣称汪为“季兄”，汪称蔣为“介弟”。

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时又兼軍事委员会主席，蔣虽在表面上予以輔弼，而在骨子里則是別有用心。但是汪精卫善于籠絡元老派，一面又

假惺惺地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故在当时尚有一定政治声誉。因此，汪就想大权独揽，特别是在人事任用方面，几乎一手包办，不会征求蒋的意见。于是，蒋介石为了同汪对抗，就在黄埔军校组成了一个所谓“孙文主义学会”，其中主要成员有教育长王柏龄，学生邓文仪、贺衷寒、缪斌等。后来，所有蒋的亲信，如陈肇英、欧阳格、徐桴、陈策、吴铁城等也都成为该会的重要分子。当该会成立之初，王、陈、吴等虽也曾请汪精卫去讲讲话，表面上装作对汪尊重，背后却经常造谣，挑拨离间，企图造成政局不安，并且支持蒋介石反俄、反共，其中最恶毒的是王柏龄。

当年的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心情是：一则恐惧，二则怀恨。因为蒋自认为“唯一军事家”，深知“有了军权就有了一切”。他在军事上植势之后，就一意孤行，要想实施独裁制度，压制民主，在一切措施上，一贯隐蔽和欺骗群众。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日高，他很害怕共产党员会在军队里深得人心，由猜忌而恐惧而怀恨。所以在东征结束后，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企图把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排挤出去，特别是在原由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方面，他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

二 蒋介石阴谋制造“事变”

由于以上两种矛盾的存在，蒋介石蓄意兴风作浪，企图反俄、反共；同时打击汪精卫，使他应付困难，以利于排除异己，夺取领导地位。有名的中山舰“政变”事件，于是发生。“政变”的制造者，其实就是蒋介石；参加策划的则有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王柏龄、陈肇英、徐桴、欧阳格、吴铁城、陈策、缪斌等。

陈肇英也是蒋介石的换帖兄弟，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情

誼很深，是当时蔣的心腹人物之一。他职充虎門要塞司令，手下拥有几艘兵舰，平时常常假借职权，利用兵舰大做走私生意，获利甚多。当时有李之龙者，系海軍局局长，品质超凡，作风正派。他发现陈肇英以兵舰走私一事之后，深为憤慨，就向汪精卫报告，经汪批准，由李出动海軍制止，曾经将其人貨一并扣留在海軍局。由此，陈肇英与李之龙結下怨仇，就想寻事报复。

当蔣介石蓄意制造混乱局面，企图乘乱屠杀共产党员，同时逼走汪精卫的时候，陈肇英为了陷害李之龙，就在蔣介石面前极力慫恿，推波助澜。大約是在蔣、陈和上述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通过密室策划后，隔不了几天，在3月17日早晨，从黄埔軍校发出了惊人的謠言，說是“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軍局武装政变”。謠传散布，引起人心不安，叫喊得最为热烈的是王柏齡，他是黄埔軍校的教育长兼第一軍第二师师长。

三 “事变”的经过

3月17日黎明，蔣介石突然由黄埔乘汽艇来到广州东堤八旗会馆——卫戍总司令部(原东征軍总部)。先一天，我刚从汕头回到广州，因眷属尚在汕头，宿在該部秘书长房間里。他进入办公室同我碰面，我看他这次沒有带便衣卫队，而其神气有些紧张。正在猜想間，他先問我：“你有没有听到特別情况？”

我答：“沒有。”問他：“有什么特殊情况？”

他說：“中山舰开到黄埔，有阴谋。”

我說：“我沒听到，是不是需要了解一下？”

他說：“不需要，我要回家看看。”說罢，就坐了汽車回东山公馆去了。

3月18、19两天，我都在卫戍总部休息，未曾出外。19日深夜时分（大约已11时左右），我已就寝，忽然由经理处派来了汽车来接我，要我马上去经理处见蒋校长，刻不容缓。经理处在广州火车站附近，我到达时，看到刘峙和蒋鼎文、惠东昇两个团长都在；还有陈肇英、徐桴、欧阳格等亦在座。蒋对我的说话很简单，只说：“今晚要戒严，卫戍总司令部的印信在哪里？”其时，卫戍总部因东征军总部成立后，大部分人员都已调开，仅留参谋长李章达及少数职员。我去汕头五、六个月才回来，情况亦已有些隔膜。我随口回答：“印信已不归我管，总在卫戍总部吧。”他要我立即去找来。于是我又赶回卫戍总部，唤醒有关职员，拿到印信交由蒋的侍从书记吴家旌送到经理处去。正在此时，卫戍总部参谋长李章达来电话询问：“今晚为什么要戒严？”我回答不知。李又说：“请你问问校长。”于是我又到了经理处，打听戒严原因。据欧阳格说：“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唆使中山舰开进黄埔，劫去蒋校长，送往海参崴转送莫斯科，该舰已于昨日窜泊黄埔水面，事态十分严重。刘峙和两个团长是前来接受命令部署军事行动的。”

戒严是在深夜12时开始的。其时蒋介石就在经理处亲作严密布置；他以兼卫戍总司令的职权，调动了较多的武装部队，而其主要的兵力却放在包围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包括“省港罢工委员会”，派惠东昇负责，以惠的全团兵力再加上广州公安局的武装警察，执行这一任务；出动时个个枪膛实弹，枪头上了刺刀，准备厮杀。派公安局长吴铁城率领一部分武装警察，执行包围汪精卫住宅的任务，名义上称为“保护”。派蒋鼎文率部占领海军局，解除该局的武装力量。派陈肇英和欧阳格率部逮捕海军局长李之龙，并指定欧阳格兼负劫夺中山舰任务，并令暂代该舰舰长。

蔣介石又親自以電話命令第一軍親信的各師、團長，要他們將各該部隊黨代表中的共產黨員，立即加以扣押，並加派劉峙率部配合這一行動。蔣布置完畢，又匆忙地接見了滇軍將領朱培德，密談了約半小時，內容不詳。朱辭出，已是後半夜2點多鐘了。蔣即從經理處潛往造幣廠（惠團團部所在地）隱匿。因為該處地段較為靜僻，當時知道他所在的只有我和經理處處長徐桴。蔣走時，叫我仍回衛戍總部坐守，聽到什麼情況，隨時打電話給他。

到3月20日早晨止，廣州沒有發現大量的火藥氣味，這是出於我的意料之外的。事後得悉：是晚虧得共產黨機關和共產黨領導人都能鎮靜從事，對惠團兵員及武裝警察的騷擾，甚至於有個別開槍射擊的，共產黨機關絕對不予回擊。這樣一來，就逼使惠團官兵無法滋事。

戒嚴一直持續到3月20日上午，還沒有停止。那時我在衛戍總司令部，深感此事沒有如此嚴重的必要，並且這次“戒嚴”又沒有通過國民政府。因此我想去看看汪精衛，但是汪的住宅已在“保護”的名義下受了包圍，並且是蔣所不滿的，不便前往。次而想起譚延闓，平素較為蔣所尊重，因此我就到了譚宅（20日上午7時許）。譚問起“戒嚴”之事，他認為事態搞得太嚴重了，應該及時挽回；並且表示很想和蔣介石談一談，問我蔣校長現在何處。我不便即時據實告知，只說待我去聯繫一下即來回話。於是我又回到衛戍總司令部，與蔣搖通電話，告以譚的意見，蔣表示願意和他談談。我又立刻趕去譚宅，和譚同車至蔣處。蔣在接見譚時，神色很鎮定，表示可以和平解決，允即下令通知解嚴，並將惠東昇一團調回造幣廠，暫負“侍衛”之責。

此時，蔣的親信繆斌進來向蔣報告：“所有第一軍的黨代表中

的共產黨員已予一律扣押。”蔣在當時不作表示。譚和繆斌走后不久，惠東昇的部隊剛開到，就有何香凝及周恩來相繼而至。周等坐候多時，蔣始出而接談。這時，惠東昇在大門口把守，竟將周的汽車上衛兵的槍械繳去。惠對我說：“看他進得來，就出不去。”我說：“未奉令而繳槍，是違反軍紀。你把事情看錯了。”接着惠東昇得知事情已經起了變化，就將槍枝發還。何、周二位和蔣所談內容，我不清楚。在當日(20日)下午，許多被扣的共產黨員就恢復了自由，情形開始好轉。蔣介石對我說：“中山艦是受海軍局命令開進黃埔的，‘事變’的責任主要在李之龍身上，現已將李扣押在經理處，交給你去審訊。”蔣因我當過東征軍的軍法處長，所以要我做幫凶。

海軍局局長李之龍是在3月19日下半夜被陳肇英等率兵逮捕的。李新婚不久，在夢中被拖出來，上身只穿一件襯衣，下身只穿一條短褲，雙手反綁，眼睛蒙起，嘴巴塞住，像架“肉票”那樣把他弄到經理處。我向經理處處長徐桴等出示蔣的手諭之後，開庭提審二次。李之龍連稱冤枉，對所謂“通同共產黨劫持蔣介石之事”堅不承認，同時一再申明：“中山艦開進黃埔，是由於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朱一鴻，親自來海軍局向我傳達蔣校長的口頭命令，說該校急需使用中山艦，着速開往黃埔停泊候調，這是17日下午的事。乃於18日早晨，命令該艦駛去黃埔候差。”等語。除此之外，再也審不出其他口供。當晚，我向蔣介石報告審問情況。蔣對我的報告很不滿意，氣憤地說：“那麼你去將朱一鴻逮捕起來吧！”我看他的神色不對，只得隨風轉舵，輕輕地回答：“如將此事看得太嚴重也不大好。”蔣的表情沒有什麼反映，也不再提起逮捕朱一鴻之事(朱駐省城專管招待及船艇事務)。他沉默了一會，又說：“你一個人審問不了，加派第二軍軍法處長戴貞纘會審。”

第二天我和戴貞纘在经理处碰头，事前研究了怎样进行审讯。戴說：“李之龙不肯承认，是刁猾。”他主张用刑訊，我坚决反对，結果沒有动刑。经会同庭訊多次，仍无所得。于是我用书面向蔣介石建議：“李案叠经会审，仍无充分罪证，原报告是否完全属实，有待調查，拟先准保释。”蔣介石的批示是“暫行看管，再偵查。”此案就是这样擱起。李之龙被移押何处，我不知道，直到7月間才把他释放出来。

四 “事变”的结局

经此事件之后，汪精卫经常称病不視事，各方面也对蔣介石頗有不好的評論。蔣在这时还不敢公开反共，还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来进行北伐；并且顾虑包围苏联顧問团住宅一事，会引起苏联的反感，会影响苏联对軍事上的援助（其时苏联有一批枪弹要运来）。因此，他又不得不假惺惺地去見汪精卫，承认錯誤，并請汪轉向苏联顧問鮑罗廷解释，因为当时汪和鮑比較亲近。但蔣对事件的责任則又全部推在李之龙和其他部属的身上，表示要“严加处分”。据聞，当时汪对蔣的态度也很冷淡。

同年4月9日，蔣介石致汪精卫信上說，3月20日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他在辞职未获批示的期間，軍紀废弛，整頓无方，遂致一发不可收拾；其次是“我兄（汪）于3月初召集孙文主义学会会员讲话时，有‘中国革命不成，又欲杀共产党乎’之語，以致引起共产党与各軍官的恶感，迫使各軍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举。”云云。从这里可以看出，蔣是如何来掩飾自己的阴谋詭計而把責任推到部属身上了。接着，他就对“中山舰事件”作出了所謂“处分”。实际上只是李之龙无辜下獄，真正吃到一些苦头，而对于他自己的亲信人

员则无非是一出愿打愿挨的“苦肉计”而已。当将王柏龄解除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职务，陈肇英免去虎门要塞司令职务，均着即离开广州。欧阳格也被免去暂代中山舰舰长，吴铁城免去新编第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公安局长，均送往虎门炮台“软禁”。

蒋介石作出“处理”时，曾召我到他的“公馆”中，就叫我坐在他的办公桌上起稿子。当时我觉得吴铁城等罪责不轻，向蒋请示。蒋答：“就用图谋不轨的罪名吧！”蒋介石所一手制造的风波——中山舰“政变”事件，至此告一结束。

自此而后，汪精卫眼看蒋介石的声势逐步咄咄逼人，他因为不甘心做傀儡主席，就在同年4月中旬弃职出国。

汪精卫走后，蒋即支持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会主席改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由张静江继任，蒋即自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谭是好好先生，他兼任第二军军长，要受军事委员会节制；而蒋对于张，根本无所顾忌。事实上他们都是傀儡。党、政、军大权从此就为蒋介石所控制。而在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后，蒋介石以缪斌为党代表，第一军就成为他的清一色嫡系部队了。

当汪走了之后，蒋介石曾经叫我将政局变化情况，用密电通知徐桴和陈肇英等。因此，我对“中山舰事件”的内幕，就更为明了。蒋既大权在握，就处心积虑地为实现其独裁的政治野心而积极创造条件。及至北伐取得胜利，他就悍然背叛革命了。

（家属吕德懿提供）

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會議

黃 紹 竑

一

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我是同蔣介石合謀发动的桂系軍閥首腦之一。4月2日蔣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會議，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樞紐，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濟深都参加过那次會議。这次反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滿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願意接触的。李濟深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曾經鼓励我写历史資料。他說，“你應該把我們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那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訴你。”現在李濟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會議的，在大陆只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觉得更有責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我写这一篇資料，目的主要是暴露事实真相，可能写得不全面，分析批判更是不够的，希望讀者指正并严加批判。

二

1927年3月下旬某日，我在南宁接到李濟深从广州拍来急电，要我立刻秘密去广州商量要事。那时我因家眷还住在广州珠江顧养园，广州是时常来往的，因而我这次去广州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

意。我乘专輪到广州后，立即同李济深見了面。他取出一份蔣介石由南昌拍来的密电給我看，內容是要李济深和我两人克日到上海同他商量重要問題。电报里虽然沒有說明是什么重要問題，可是李济深和我都不約而同地料定，一定是为了反共，因为那时候南昌、武汉以及各地的国共斗争已经很露骨了。我和李济深互相交換了一些情况和看法，在反共这个問題上彼此所見略同，不謀而合，于是，我們就决定同去上海。他說，到香港和上海的船票都已经准备好了，下午就要动身；他并且提醒我說，現在碼头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糾察队監視很严，我們行动要秘密。我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訴我的妻子。为了保持行动秘密，她劝我把留了六七年的落腮胡須剃去。我就匆匆忙忙剃去胡子，坐了一只小艇悄悄地登上了省港輪船泰山号。

在泰山号船上，我同李济深見了面，同行的还有馮祝万（那时他是參謀长还是財政厅长，已記不清）、陈孚木及随从一人。我們当晚10点多钟就到了香港，李民欣早已在碼头上秘密迎接。他同香港的一班买办有联系（他的老婆是香港某买办的女儿），从香港到上海的船票已经由他办好了。我們下了省港輪船泰山号，馬上就上了美国邮船庇亚士总統号。第二天，邮船就向上海开行了。

在由香港赴沪途中，我們在船上也作了几次秘密談話，內容无非是补述一些当地情况和商量到上海以后的共同主张，由陈孚木作記錄。陈孚木是廖仲愷被刺时同时遇难的陈秋霖的老弟，此行替我們担任秘书。

4月2日上午，邮船駛入黃浦江，还没有泊碼頭，白崇禧就派他的參謀长兼上海市市长张定璠乘海关小火輪到船上来迎接我們了。他一見面，就告訴我們說，租界里万不能住。他說：“自从我軍

克复上海之后，租界的周围都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糾察队严密封鎖，他們同租界里的外国軍警隔着铁絲网对峙着，住在租界不但出入不方便，而且很危險。白总指揮要你們两位到他的总指揮部去住。”我們就乘小火輪直接开往設在高昌庙江南兵工厂里面的东路軍前敌总指揮部。我們在小火輪上看見滿江外国兵舰的大炮都褪了炮衣，指向上海市区，情况的确相当严重。船到了高昌庙，李宗仁、白崇禧都在碼頭上迎接我們，李宗仁也住在总指揮部里。

三

在我們到达上海以前不久，蔣介石就已经到了上海。我們到上海那天(4月2日)的下午，他和何应欽、吳稚暉(当时任南昌总政治部主任)、李石曾、陈果夫(中央監察委員)、陈立夫(蔣介石的机要秘书)来到东路軍前敌总指揮部开会，参加會議的除了同来的这几个人之外，还有住在总指揮部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我。蔣介石首先发言，說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和为什么要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他說：“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們(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們的組織仍然保存，并且在我們党内发展組織。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謀日益暴露。北伐軍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現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軍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最后，他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見。

到会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內)都是主张“反共”的，自然决不会有相反的意見，而是从一致的反动立場出发，罗列一些歪曲事实的

“亲身見聞”加以渲染夸大，来污蔑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以此来加强“反共清党”的气氛。李济深首先报告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說：“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鎮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維持了。”我也接着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說了一番，并且說：“現在要鎮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鎮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們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維護着农民”，从而，我的結論自然也是“必須早日清党反共”。

何应欽在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况时着重談到南京慘案。他居然为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恶作辯护，把南京慘案的責任加在共产党身上，說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搶了、打了外国領事館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白崇禧发言最多。他說：“上海自我軍占領之后，工人就組織糾察队封鎖租界。他們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揮系統，不服从軍事长官的指揮。他們要冲入租界，占領租界。現在外国領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滿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們，租界里新近調来了不少外国軍隊。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他还誣蔑共产党“离間”軍隊，說：“第一軍住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二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反共)命令認真一些，他們就貼标語、散传单要打倒他；第一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們表面上接近一些，他們就貼标語、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們的軍隊也要发生变化。”白崇禧又說：“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們的組織，还有他們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嘯林、楊虎都是坚决反

共的。”

吳稚暉的发言滿口无錫土音，我不大听得懂，只听见他說什么“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等等謬論。他的話我虽然不太懂，但是当时我对他这个人还是相当“敬仰”的，认为他是“理論家”（蔣介石称他为国民党的“瑰宝”）。陈果夫不大說話，我同他是第一次会面。他身穿长衫，罩上一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錢庄的挡手。李宗仁也談了一些軍隊政治部問題以及他在地方上所看到的問題。

这次秘密會議上各个人的发言，深刻地反映出以蔣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包括我自己在內）在共产党所領導的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面前战慄危惧的心情，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們迫不及待地企图扑杀革命的反动阶级本能。“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針”就在这次充滿血腥气的秘密會議上决定下来，而我們这几个桂系軍閥头目追随蔣介石合謀叛变革命的滔天罪行也就从此开始。

四

在4月2日秘密會議以后，为了使“反共清党”合法化，4月5日上午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談話会。参加的有蔣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张靜江等（查閱当时上海报載出席的还有汪精卫、甘乃光，实际上此二人并未参加）。由于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員和監察委員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这次会上就决定由吳稚暉向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謀叛的呈文，并盜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名义据以咨請中央执行委員會、国民

革命軍总司令蔣介石以及地方軍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这个咨文是由蔣介石授意，由吳稚暉、陈果夫等包办的，内容如何，当时我并未看过，現在将查到的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咨文摘录如下：

“(銜略)窃本会职责所在，‘党员施政方针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尙应过問，則奔裂本党政纲、酿成亡党卖国之行为尤应举发。是以本会委员分赴各地，遇集上海，遂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开临时会议，决定于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到会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黃紹竑、张人杰、吳敬恒、李煜瀛、陈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吳敬恒提出‘共产党連結容納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謀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討論，……全场一致議决將訪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請貴委員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將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險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暂时分別看管監視，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須和平待遇，一面由貴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議处分。(下略)”

这个咨文表面上好像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进行处理，实际上不过是替蔣介石叛变革命的阴谋作政治上、輿論上的准备，替他制造借口而已。而且这个咨文所称四月二日举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一节，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即使把那天的秘密会议改头換面，冒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话，当时在场的也只有李宗仁、黃紹竑、吳稚暉、李石曾、陈果夫五人，只占全体中监委二十人的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靜江三人并未参加，即使把这三个人加上，也还不足半数。可是咨文不但把三个不在場的人加上，“公推”一个不在場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

人数說成是三分之二。这种睁着眼睛說胡話的撒謊伎倆也实在太拙劣可笑了。

蔣介石在接到咨文后，复函中央監察委員會称，“中正接奉四月二日貴会全体紧急會議決議举发共产党謀叛证据来咨，……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轄各軍汛地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靜候中央执行委員會全体會議共議处分矣。”从中监会的咨文和蔣介石的这个复函看来，似乎蔣介石的反共并非出于他的策动，而是根据国民党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举发，实际上，这完全是蔣介石一手布置的烟幕。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开始，蔣介石是一貫搬弄这一套手法来掩人耳目的。

最后，中央監察委員邓澤如、黃紹竑、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靜江、陈果夫等人又在4月9日联名发表了一通长达三千余言的“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摘武汉国民党左派“不合者”二事，列举“可痛心者”九事。电文最后說：“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黨員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险象如此，詎能再安緘默？爰痛切陈詞，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凜丧亡之无日，被发纓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傾，端視此举。披瀝奉陈，敬候明教。”

此电发出后，以蔣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下手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从这个“护党救国”通电发出后的第三天——4月12日起，在蔣介石、帝国主义、买办資產階級、帮会流氓以及我們这一小撮反动軍閥和投机政客的共同合作下，一場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